

早期“兒”字合音釋例

孫景濤

香港科技大學

提要

以 -n 尾表示小稱常見於現代方言尤其是東南方言。古代是否有同類現象？這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。基於語音語義兩個方面的證據，本文認為“娘（少女）”和“伴／叛（用於指稱某類女子）”分別是“女+兒”、“婆+兒”的合音。後綴“兒”最初是獨立音節，後因高頻虛化，致使其鼻音聲母前附根詞成爲韻尾，這種肇始於中古時代的語言現象是典型的音義互動實例。

關鍵詞

“兒”後綴，音義互動，漢語史

1. 引言

在現代漢語方言中，指小有音段（包括音節）、超音段（主要是高調¹）、韻律（重疊）等三種表達方式。就音段而言，其來源多可上溯至“兒”。“兒”的本義是嬰孩，後來一再引申，最後虛化為指小詞綴，表現形式可謂形形色色。

¹ 也有以非高調表示小稱的實例，如新會粵語。參看譚雨田（Tan 2010）。依照其他粵語方言以及一般通則，可知非高調應是後來發展的結果，但高調如何變為低調仍有待深入研究。

表 1 現代方言中的詞綴“兒”

| 類別 | | 例子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|
| i. 兒音 獨立 | a. 獨立音節 | 蘇州話 小幹件(小孩兒) $\text{cia}^{52} \text{ko}^{44/23} \eta^{223/21}$ (李小凡 1998) 博白粵語 鵝兒 $\eta\text{ə} \text{ni}$ (王力 1958) 河北順平話 棚兒 $\text{p}^{\text{h}}\text{ə}\eta^{22} \eta\text{ə}^{\text{t}0}$ (孫景濤 2007) 山西壽陽話 ər^{21} , 興縣話 $\cdot\text{lə}$, 武鄉話 $\cdot\text{l}_i$ (喬全生 2000) |
| | b. 獨立音節加高調 | 高州粵語 牛兒 $\eta\text{eu}^{11} \text{ni}^{55}$ (邵慧君 2005) |
| ii. 兒音 融合 | c. -r 化 | 普通話 米粒兒 $\text{mi}^{214} \text{lja}^{\text{t}51}$ 河南偃師話 羔兒 $\text{kja}^{\text{t}1}$ (張慧麗 2010) |
| | d. 特定元音化 | 洛陽話 樹枝兒 $\text{ʂu}^{412} \text{tsəu}^{33}$ (賀巍 1993) |
| | e. -n 化/-ŋ 化/鼻化 | 休寧徽語 歌兒 kən^{11} (伍巍、王媛媛 2006) 義烏吳語 小雞兒 $\text{sɿu}^{53-33} \text{ci:n}^{33}$ (方松熹 1986) 壽昌徽語 蝴蝶兒 $\text{u}^{11} \text{t}^{\text{h}}\text{iã}^{34}$ (趙日新 1999) |
| | f. -n 化加高調 | 信宜粵語 豬兒 tʃyn^{h} (葉國泉、唐志東 1982) |

上表列舉的“兒”字可概括為兩大類。一是音節獨立，二是合音。合音情況相當複雜，這主要是由“兒”字音韻的時空別異所造成的。“兒”字中古有鼻音聲母（王力 $\text{n}^{\text{h}}\text{ie}$ ，蒲立本 niã ，邵榮芬 nzie ），由於方音發展遲速有別，合音切入時點不同，致使歧異紛呈。大體說來，“兒”在北方話中發展較快，在早期官話（《中原音韻》）中葉已丟掉鼻音聲母，薛鳳生（Hsueh 1975）擬作 ri ，蒲立本（Pulleyblank 1991）擬作 r^{h} ，今官話方言多讀 ə 。如果在這些情況下發生前附詞根的合音，結果應該是 -r 化，像北京話那樣。“兒”在東南方言中發展較慢，許多口語詞至今依然是鼻音聲母或鼻音自成音節。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發生前附詞根的合音，那麼鼻音便有可能依附詞根音節，出現 -n 化（包括 -ŋ 化和鼻化）。信宜粵語“兒”讀 ni^{23} ，以之指小，鼻音聲母便併入詞根音節充當韻尾，比如併入 tsy^{53} （豬），形成 tsyn^{h} （同時出現高調），表示小豬（參看羅康寧、葉國泉 1987: 13, 201）。需要指出的是，“兒”字沒有鼻音成分但該方言仍然可以有 -n 化，如休寧、歙縣、黟縣徽語中多有 -n 化實例，而那裡的“兒”字分別讀作 ə^{55} 、 ɛ^{44} 、 xv^{44} （參看平田昌司 1998），這是由“兒”的歷史音變以及 -n 化詞定型所造成的。

-r 化和 -n 化是現代方言中常見的語言現象。早期情況如何？值得深入探討。近幾十年來，很多學者，如李思敬（1986）、季永海（1999）、王福堂（2002），

曾探討 -r 化歷史，本文則揭示歷史上的 -n 化現象，重點討論中古出現的單音名稱。

論及事物命名，荀子曾有精到斷語：“單足以喻則單，單不足以喻則兼。”（荀子·正名）大意是：用單音節足以表明事物，就用單音節，單音節不足以表明事物，就用雙音節。這個意思亦可用以描述漢語構詞的發展過程。先民經歷的事物相對簡單，因此先秦古漢語中的根詞（root）是單音節，²後來日趨複雜，合成詞大行其道，漢魏以後尤其如此。有鑑於此，如果漢魏以降出現單音詞，而且很常用，那就理應有一個說法。比如，佛、媽、叵、擊（土坯）首見於中古，它們分別是外來詞佛陀（Buddha）的簡稱、“母”的口語形式、“不可”的合音、同音詞“擊”的引申結果，它們並非得名之由難以尋繹的原始形式。由此觀之，中古出現的單音詞，還很常用，尤其值得注意。

2. 女 + 兒 → 娘

“娘”首見於中古，最初表示少女。《玉篇·女部》：“娘，少女之號。”這一用法多見於南方，如《樂府詩集·清商曲辭·子夜歌》：“見娘喜容媚，願得結金蘭。《樂府詩集·清商曲辭·江陵女歌》：“拾得娘裙帶，同心結兩頭。”中原亦有用例。北魏北海王妃李元姜（496-512）“墓誌銘”：“春秋一十有七，薨於洛陽里宅。……四德宣揚，六行允塞，彼姝名娘，實邦之則。”（見《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·北魏》）李元姜亡時年僅十七，因此仍稱為“娘”。上古沒有“娘”字，中古冒出，而且很常用，令人疑心背後有文章。

基於意義用法、文獻時代、語音特質、現代方言，我認為“娘”字可能是“女兒”的合音。先從意思、時代兩個方面考察。“女兒”和“娘”是同義詞。“娘”的用例見前，下面是“女兒”用例。《玉臺新詠·古詩〈為焦仲卿妻作〉》：“昔作女兒時，生小出野里。”南朝宋鮑照《代北風涼行》：“北風涼，雨雪雱，京洛女兒多妍粧。”《樂府詩集·清商曲辭·襄陽樂》（傳為劉宋時代作品）：“大堤諸女兒，花豔驚郎目。”南朝蕭衍《東飛伯勞歌》：“女兒年幾十五六，窈窕無雙顏如玉。”以上“女兒”例均為少女義，與“娘”完全相同。從時代上看，以上援引皆為“女兒（少女義）”和“娘”的最早用例，它們見於六朝，據現有文獻似乎難分先後。不過，“女兒”中古以前已有用例。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

² 董同龢《上古音韻表稿》共收 11,932 字，此為古漢語根詞主體。雙音連綿詞亦很常見，不過，大都源於單音節重疊。參看孫景濤（2008）。

傳》：“且趙王素出將軍下，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，請追殺之。”其中“女兒”指趙王（武臣）的姐姐。這段話的背景是武臣的姐姐飲酒歸來，路遇大將李良而輕慢之，李良的隨從是以如此放言。《漢語大詞典》釋“女兒”為“女子”，可通，但此處明顯有小覷輕慢意，理解為小女子、小丫頭更合適些，與“少女”義非常接近。另外，“焦仲卿妻”事出漢末，冠以古詩，總與“古詩十九首”的時代有些瓜葛，產生不會太晚。那麼，其中表示少女的“女兒”一詞也許在漢末就產生了。如此看來，“女兒”（少女）比“娘”出現得要早些，假設後者由前者而來符合時代邏輯。

這一假設還與合音常例相符。合音現象古已有之，多涉及常用虛詞，如，不+之=弗，而+已=耳，之+於／乎=諸，不+可=叵。“兒”字漢代以來常用於人名或指稱，如男兒、孫兒、童兒、龍兒、伎兒、戲兒、盲兒、乞兒、屠兒、婦兒、驢兒、貧兒，（參看向熹 2010，竺家寧 2005）高頻常用，位置固定，近似虛詞，存在合音的可能。

現在考察語音上的關係。由於假設的合音發生在中古或者與上古交界之時代，所以列出兩個階段的構擬。

表 2 “女、兒、娘”的擬音

| | | 女（泥語開三上） | 兒（日支開三平） | 娘（泥陽開三平） |
|-----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上古音 | 王力 | nĩɑ | nĩe | nĩɑŋ |
| | 李方桂 | nrjagx | ŋjig | nrjaŋ |
| | 鄭張尚芳 | naʔ | ŋee | naŋ |
| 中古音 | 王力 | nĩo | nziẽ | nĩɑŋ |
| | 蒲立本 | nrĩɑʔ | ŋĩɑ / ɲĩ | nrĩɑŋ |

基於以上無論哪一種擬音方案，合音過程均可得到說明——將“女”和“兒”融合相加，即可大體得到“娘”的讀音。下面討論細節。

第一，音節合音多循兩種方式，一是“主輔合音”，前面音節的聲母和主元音與後面音節的聲母相合。二是反切合音，前面音節的聲母和後面音節韻母相合。“女”與“兒”的合音屬於“主輔合音”。這種合音方式上古已有先例，如，前面舉出的“不+之=弗”（李方桂擬音 *pjəg+*tjəg=*pjət），還有，現代方言“兒”字合音同此，例子見前面表 1 中的 ii. e。“女+兒”合音方式有例可循。

第二，合音說的一個基本要求是“娘”與“女”主元音相同。此說據上古音沒問題，據中古音則需要說明，因為 -a- 不見於“女”字擬音。這個問題可從兩個方面理解。首先，據丁邦新（Ting 1975: 239），“女”字所屬的魚部魏晉時代主元音是 -a-，與“娘”相同，如果合音此時發生，主元音並不違拗。再有，“娘”早期用例多見於江左，而從現代南部吳語看，“女”多以 -a- 為主元音，如曹志耘（2002: 224）列舉十一處方言，九處是 -a-（包括一處是 -ɛ-）。憑今擬古，“女”字中古時代在這一地區讀 -a- 應當更為普遍。“女”字主元音之於我們的假說不構成問題。

第三，按照合音說，“娘”的 -ŋ 尾源自“兒”字聲母的前附。依照李方桂、鄭張尚芳的古音構擬，這很容易理解，因為“兒”的聲母是 ɲ-，附於“女”，形成“娘”，結果恰好是 -ŋ。或者，如果合音時代當地“兒”字讀 ɲ，一如今天的寧波話（參看徐通鏘 1985），那麼後附於“女”自然就是“娘”了。依照中古擬音，“兒”的聲母是前鼻音 n- 或顎化鼻音 ɲ-（n-），不同於“娘”字的 -ŋ 尾。實際這不是大問題。就統攝字數而言，很多東南方言中 -ŋ 尾多，-n 尾少（脫落或併入 -ŋ 尾）；另外，作為韻尾，-ŋ 比 -n 更具無標記的特點，-ŋ 充任韻尾會更為自然些。比如，根據伍巍、王媛媛（2006），在安徽歙縣城郊張老先生口中，兒化多為 -n 尾，合乎規律，但也有 -ŋ 尾例，如：簿兒 puŋ³⁵（← pu³⁵）、舅舅兒 tɕio³⁵⁻³³ tɕioŋ³⁵（← tɕio³⁵）、孀兒 ciɛŋ³⁵（← ciɛŋ³⁵）。還有，吳語“麻雀兒”變成“麻將”，紹興話 le haŋ（來亨，“在那兒”）的 haŋ 是“許兒”的合音（潘悟雲 2007），寧波話中“叔叔”的第二個“叔”字“讀若宋”，“陀螺讀若唐郎”³（見《鄞縣通志》），都是同樣的情形。當然，我們不能將今天的方言等同於古代語言，但是，-ŋ 比 -n 更具無標記的特點帶有普遍性，詞根加上 n- 而成為 -ŋ 是現代方言中的事實，它在古代同樣是可能的。

第四，按照合音說，“娘”源自“女”加上“兒”的聲母。由於聲調附著主元音，所以，這個合音字應該是上聲，而“娘”是平聲，似有違拗。實際問題不大。鼻尾加變調以指小很常見。如休寧方言加 -n 的同時還要變為 24 調，若要強調則變為 35 調。⁴ 準此，“娘”有可能是鼻尾加變調的產物，它的聲調異於“女”字并不奇怪。還有一種可能。在《切韻》音系中，宕攝開口三等有陽（平）、養（上）、漾（去）、藥（入）四韻相配。屬於這一韻系的“女”字是上聲，以“主

³ 先是“陀螺兒”，後來“螺兒”合為陽聲韻音節，再後來是逆向同化，始有“唐郎”讀音。

⁴ 見伍巍、王媛媛（2006）。“強調”云云是伍巍先生告訴筆者的。謹此致謝。

輔合音”的方式與“兒”融合，得到的結果應該在上聲養韻。但是，宕攝開口三等娘母上聲是個空位（參看邵榮芬 1982: 159），就是說，娘母拼合養韻而成的音節不見於中古音系。無奈之下，調整為相應的平聲陽韻，正是“娘”字的讀音。⁵

以上基於古今證據，說明“女”加“兒”進而產生“娘”的可能性。下面從詞語產生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。我們在實際語言中看到，加 -n（或 -ŋ）之後如果僅是指小喜愛意味的差別，那麼語言社團一般不會看作新詞，遑論用專字表示。反之，如果表義範疇有變，那麼就有可能看作新詞，並且有可能使用專字表示。據《鄞縣通志》，⁶當地表示物體頂端或末端的“頭”多加鼻音韻尾，如壁角落頭、小舌頭、小／大水頭（潮水），編著者指出“頭”字“讀若潭”。在這些用例中，“頭”字讀音有變，不過意義上並無範疇轉移，所以通常仍寫本字。但是，因使用場合特殊而意義範疇有所變化時，人們就會覺得出現了新的成員，有可能另外擇字表示。例如，舟山話的“眼角落頭”（眼角）有人寫作“眼角落潭”；⁷寧波話裡有“二竈頭”的說法，⁸用為路名寫作“二竈潭”（見於寧波慈溪市），由於用例不同於“頭”的典型用法，像是新的成分，因此寫作“潭”。歷史上“女+兒”的情況與此相似。“女”表示女子、女兒之類的意思，“兒”字前附之後表示“少女”，從意義範疇來看，這不像是“女”的變體，而像是一個新的單位，於是語言社團使其“獨立”，並創制“娘”字表示。⁹

3. 婆 + 兒 → 叛 / 伴 / 盼

李白詩云：“君歌楊叛兒，妾勸新豐酒。”其中“楊叛兒”是樂府曲名，本事頗多曲折。據《魏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舊唐書》、《樂府詩集》，南齊蕭昭業

⁵ 理論上說，也有變讀為去聲漾韻（如“釀”字）的可能。其中細節目前尚難釐清，也許平聲調高，這種臨時調整同時還受調高表小稱規則的支配。

⁶ 鄞縣縣治在民國以前設在今寧波城區一帶。《鄞縣通志》初版於三十年代，“鄞縣”可理解為今寧波一帶。另，據侯精一（2002），甬江小片吳語指寧波、鄞縣、慈溪、鎮海、定海等十縣市的吳方言。

⁷ 見 <http://www.zslib.net/zhoushanfeiwuzhiwenhuayichan/637.html>。2013年8月7日。

⁸ 湯珍珠、陳忠敏、吳新賢（1997）收有“竈頭”一詞，解釋道：“寧波的家用竈一般為兩眼竈”。

⁹ 鄭張尚芳（2003）認為“娘”由“女郎”合音而來。從形式和意義兩個方面來看皆有道理。但是，從語言實際情況來看，合音多涉及量詞、代詞、否定詞等虛詞，或者是內部結構不明但是高頻常用的詞語。“女郎”是定中結構的實詞，不合合音常情。“女兒”與“女郎”不同。像前面《史記》中的例子，其中“女兒”的“兒”已經近似於詞綴，意思有些虛泛，因此存在合音的動因。

(郁林王)登基前曾令楊姓女巫祝禱其父祖早死，後來“兌現”，因此對楊氏倍加敬重信任，稱為楊婆。楊婆有子名珉（一作旻），隨母入宮，受到皇后何婧英的寵幸。皇帝不堪，皇后荒唐，於是有童謠曰：“楊婆兒，共戲來所歡。”傳唱之間訛變為楊伴兒（或楊叛兒）。這一記載涉及關乎本文主旨的一個實例，即，“婆+兒”合音為“伴/叛”，下面討論相關的問題。

南北朝時代，“婆”可表示母親或與母親同輩的女性，如，《樂府詩集·橫吹曲辭五·折楊柳枝歌二》：“阿婆不嫁女，那得孫兒抱。”其中的“阿婆”類似阿媽。蕭昭業因楊氏女巫“立功”而呼為楊婆，應該是尊稱，楊媽的意思。不過，“楊婆兒”曲名在早前的劉宋時代既已產生，¹⁰其中“婆”字未必指母親。前面已經提到，“楊叛兒”是由“楊婆兒”變來的，因此，“楊叛兒”的內容格調應能體現“楊婆兒”最初的含義。從現有材料看，“楊叛兒”詩大都是情歌，如“暫出白門前，楊柳可藏烏。歡作沉水香，儂作博山爐。”（見《樂府詩集》卷四十九）李白加以演繹，寫下同名詩作，有學者認為與妓女有關。再如，南朝梁武帝《楊叛兒》詩：“桃花初發紅，芳草尚抽綠。南音多有會，偏重《叛兒》曲。”根據“楊叛兒”詩的內容格調，可知“楊婆兒”最初涉及男女歡情，那麼，其中“婆”字一定不是母親義。在中古和近代漢語中，“婆”字參與的複合詞極多，常指某些職業女子，如媒人、奶媽、老鴿、妓女、巫祝、接生婦、尼姑庵中的執事、宮中女醫生、做買賣的女人。¹¹相較而言，這類女子拋頭露面，易有私情經歷，所以，最初“楊婆兒”的“婆”應與這類女子有關。具體到蕭昭業，儘管他的本意是尊稱（“婆”有母親義），但楊氏是女巫，屬於“婆”（職業女子），而且，皇后與楊氏之子有私情，暗合“楊婆兒”詩意，民間援之為題，適成絕妙的影射諷喻。

根據以上討論，可知“楊婆兒”出現之時，“婆”指某些職業女子。舊時女子地位低下，從事這些職業尤受歧視，“婆”後加“兒”體現了社會對她們的輕慢。前面已經提到“楊婆兒”訛為“楊伴兒”，現在看一下原文。《舊唐書》卷二十九·音樂二：“楊伴，本童謠歌也……童謠云：楊婆兒，共戲來。而歌語訛，遂成楊伴兒。”（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1066）這一記載道出“楊伴兒”與“楊婆兒”的聯繫，但歸因於詞兒唱錯了則太過隨意。

¹⁰ 《魏書》卷九十八：“昭業呼楊氏為婆。劉氏以來，民間亦作楊婆兒歌，蓋為此也。”宋代鄭謙《通志》卷十二：“宋氏以來，人間有楊婆兒歌，蓋此徵也。”古人相信所謂讖語預言，劉宋時代（420-479）已有“楊婆兒”歌，其所顯示的徵兆到南齊時代（479-502）才得到應驗。

¹¹ 參看《漢語大詞典》，尤其是以“婆”收尾的條目。

我認為“伴”是“婆”(ba)加上“兒”字聲母(j/n)的結果，發展脈絡如右：①楊婆兒→②楊伴→③楊伴兒→④楊叛兒。按照《舊唐書》的記載，③似乎直接由①變來，而實際應是①變②，後來才疊床架屋，再一次加“兒”，變成③。¹²“婆兒”變成“伴”從語音上看相當契合。基於《切韻》擬音，很容易理解這一合音過程：婆 ba + 兒 $ni\alpha/ni$ → 伴 ban。¹³“婆”與“兒”的聲母相加，得到 ban。由於音韻系統不容 -n 尾，於是轉為 -n 尾，形成 ban，恰是“伴”字的讀音。¹⁴當然，依照合音規則，“婆+兒”的合音形式應與“婆”字聲調相同，然而這裡卻有平聲（婆）與上聲（伴）的不同。不過，這是可以解釋的。從現代方言看，附加 -n 尾常常伴隨高升調，如休寧變為 24 或 35（見前），廣東信宜則升入另一調域（葉德泉、唐志東 1982）。由於上聲公認是高升調，（如，參看丁邦新 1975，梅祖麟 1982）“伴”是上聲，因此，“婆+兒”變“伴”同時可以認為是聲調變高；這是高調表示小稱的實例，恰與現代休寧方言、信宜方言的情況相合。

現在討論“③楊伴兒→④楊叛兒”。“伴”與“叛”皆為全濁聲母 b-，韻母則完全相同，差別僅在於前者是上聲後者是去聲。根據周祖謨（1959）的研究，全濁上聲在唐代已經歸入去聲。“伴”是全濁上，照例變成去聲，與“叛”字完全同音。“伴”字換成“叛”字語音上沒有任何障礙。而且，“楊伴兒”為“楊叛兒”所替代大體上說發生在唐代，時代上也不存在問題。另一方面，“伴”字見於民歌合音，秉筆采風本來就是據音記字，並無厚重的語文傳統需要恪守，彼一時用“伴”字，此一時用“叛”字，都是簡單正常的事情。

以上我們從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對“婆+兒→伴/叛”的假設進行了論證。“婆兒”變“伴”具有語義表達上的動因，——“兒”作為詞綴傾向於促成合音，同時在語音上又非常契合，因此這一假設是可以成立的。

¹² 《金瓶梅》中詢問時間常見三種形式：多早晚、多咱、多咱晚。“咱”是“早晚”的合音，而它的後邊還可以再加“晚”字。“娘”字已經是“女+兒”的結果（見前），但是吳語“娘”（少女）字後面仍可再加“兒”字，如蘇州話中的小娘仔（小姑娘） $ci\alpha^{52} ni\alpha^{223/23} \eta^{223/21}$ （李小凡 1998: 31）。這些不合邏輯的疊床架屋與“楊伴（婆兒）兒”屬於同樣的情形。

¹³ 這裏依照蒲立本的早期中古音。如果是王力擬音，則是：婆 bua + 兒 $nzi\epsilon$ → 伴 buan。

¹⁴ 擬音是蒲立本的早期中古音。“兒”字另有 $nzi\epsilon$ （高本漢）、 $nzi\epsilon$ （王力）、 nie （潘悟雲）等不同構擬，其中 n 與 j 音值相同，同樣適用這裡的論證。

“兒”後綴融入根詞是現代方言中的常見現象，相應調查十分廣泛，分析描寫相當全面。本文側重中古漢語，發現彼時已然出現“兒”之鼻音聲母前附根詞的現象，一如現代吳語、徽語中的n化。不過，我們的研究還相當初步，搜尋更多材料，從音義兩方面入手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，以期勾勒出這類現象的發展全貌，這將是我們下一步的工作。

參考文獻

- 曹志耘。2002。《南部吳語語音研究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方松熹。1986。浙江義烏方言裏的“n”化韻。《中國語文》第6期，頁442-446。
- 郭錫良。2010。《漢字古音手冊》（增訂本）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賀巍。1993。《洛陽方言研究》。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
- 侯精一主編。2002。《現代漢語方言概論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季永海。1999。漢語兒化音的發生與發展——兼與李思敬先生商榷。《民族語文》第5期，頁19-30。
- 李方桂。1971。上古音研究。《清華學報》新9卷1、2期合刊，頁1-61。又刊於李方桂（1980）《上古音研究》（單行本）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李思敬。1986。《漢語“兒”[r]音史研究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李小凡。1998。《蘇州方言語法研究》。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- 羅康寧編著、葉國泉審定。1987。《信宜方言志》。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。
- 梅祖麟。1982。說上聲。《清華學報》新14卷1、2期合刊，頁233-241。又刊於梅祖麟（2000）《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》，頁340-351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潘悟雲。2007。歷史層次的目標與內容。收錄於丁邦新主編：《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頁22-35。
- 平田昌司主編。1998。《徽州方言研究》。東京：好文出版。
- 喬全生。2000。《晉方言語法研究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邵慧君。2005。廣東茂名粵語小稱綜論。《方言》第4期，頁337-341。
- 邵榮芬。1982。《切韻研究》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- 孫景濤。2007。從兒化看音節的重量。《中國語文》第4期，頁298-301。
- 孫景濤。2008。《古漢語重疊構詞法研究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湯珍珠、陳忠敏、吳新賢。1997。《寧波方言詞典》。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。
- 王福堂。2002。北京話兒化的產生過程。《語言學論叢》第26輯，頁75-88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王力。1958。《漢語史稿》。北京：科學出版社。
- 伍巍、王媛媛。2006。徽州方言的小稱研究。《語言研究》第26卷1期，頁67-72。
- 向熹。2010。《簡明漢語史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徐通鏞。1985。寧波方言的“鴨”[e]類詞和“兒化”的殘迹——從殘存現象看語言的發展。《中國語文》第3期，頁161-170。

- 薛鳳生 (Hsueh, F. S.)。1990。《中原音韻音位系統》 (*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*) (魯國堯、侍建國譯)。北京：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。
- 葉國泉、唐志東。1982。信宜方言的變音。《方言》第1期，頁47-51。
- 張慧麗。2010。兒化中間音、特徵擴展與F3的兩種走勢——偃師兒化與北京兒化之比較。《語言科學》第4期，頁372-385。
- 趙日新。1999。徽語的小稱音變和兒化音變。《方言》第2期，頁136-140。
- 鄭張尚芳。2003。《上古音系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周祖謨。1959。關於唐代方言中的四聲讀法的一些資料。《語言學論叢》第2輯，頁11-16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竺家寧。2005。中古漢語的“兒”後綴。《中國語文》第4期，頁346-354。
- Karlgren, Bernhard (高本漢)。1957. *Grammata Serica Recensa*. Stockholm: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. Reprinted from Bernhard Karlgren (1957) *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* 29: 1-332.
- Pulleyblank, Edwin G. (蒲立本)。1991. *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, Late Middle Chinese, and Early Mandarin*. Vancouver: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.
- Tan, Yutian (譚雨田)。2010. The diminutive tone change in Siyi dialects. MPhil thesis,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.
- Ting, Pang-Hsin (丁邦新)。1975. *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-Chin Period: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*. Taipei: Academia Sinica,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.

The Explanation with Examples of Phonetic Fusion Involving *ér* 兒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ime

Jingtao Sun

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

Abstract

Using the suffix -n to convey diminutive is commonly seen in modern dialects, especially in south-eastern dialects. Does the same hold true in the ancient time? This is the issue this paper will address. Based on phonological and semantic evidence, this paper argues that *niáng* 娘 “young girl” and *bàn* 伴 / *pàn* 叛 (used in a form of address referring to women of a certain kind) result from phonetic fusion of “*nǚ* 女 + *ér* 兒” and of “*pó* 婆 + *ér* 兒” respectively. The suffix “*ér* 兒” was originally an independent syllable, and later its nasal initial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eceding syllable root, thereby becoming a coda, due to its high frequency in use and its gradual generalization in meaning. This language phenomenon, firstly arising in Middle Chinese, is a typical case of morpho-phonological interaction.

Keywords

suffix *ér* 兒, morpho-phonological interaction,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